

都市内部的移居以及潜在的族群^①聚居区

〔美〕顾定国*

一般传统地说来，“族群散布”出现在较大规模的人口之中，但它也可能以另一模式出现，即从原先的族群区域迁移到新的、次要的族群区域。在社会学和人类学关于族群区域的研究时，基于许多原因，我们宁可把原先的族群区域作为研究对象，而把“表面较难以辨别的”次要族群区域看为在同化道路上的一个步骤，而忽略了对它的研究。故此在进行全面性都市族群划分时，我们必须警觉到这种次要族群区域的存在及其潜在和独特的动态。

族群散布的两种型式，即族群的流散和它们在新区域的再度集中，各自涉及到两个关键性和概念上的区别：一方面是“原先”和“次要”关系的不同，而另一方面是“族群团体”和“族群聚居区”的分别。“原先”关系是指亲属关系和友谊的结合。特点是重复的，长远的和多样的相互影响。“次要”关系则倾向“狭窄的，潜在和短暂性”的关系（Southall 1973:84），比较显著的例子是比如在住宅大楼电梯内的相遇，在公共市场内购买食物，或在庙宇内与他人一起参拜。

至于“族群团体”和“族群聚居区”的分别，让我们先把第一个术语作分析。在“族群社会”内，成员维持了“原先”关系，但由于在空间上和社交上的分散，不能经常互相产生“次要”的关系。故此每当一个族群真正散布在一个社会的每个角落而没有一些显著的重新结集时，上述情况便会发生。相反来说，在一个“族群聚居区”，同族群的人口密集到使“原先”和“次要”关系都能在同族群成员中保持。

因此，一个“原先的族群聚居区”是一种社会和经济网结合在一起的都市交点。这一交点为社会关系中的各个族群间提供了最初的聚居点；其族群成员的不断涌来有助于划分成一个主要的族群区域，即使这个地区本身可能原来并不是该族群大部分成员最初要落脚的地方。必须注意的是，这种观点认为，移居到一个很不同的，有其族群同一性的都市环境中去并不需要具有从异国他乡来的种族背景，而即使是本国人，只需要在社会和文化上有足够的特色就行了。

“次要的族群聚居区”照样需要原先与次要关系的族群聚居，但在其居住历史上与“主

① ethnic group常译成“族群”，其含义有如下几种解释：

1. “族群是一种社会群体，它是在较大的文化和社会体系中根据一组特质所构成的文化丛（Cultural Complex）或民族特质（ethnic traits）。其中最显著的就是这一群体的宗教的语言特征，及其成员特殊的民族或地理起源。
2. 此术语常被应用于这样的群体，这个群体的形成模式、社会传统和生活方式等特点方面与其他群体判然有别，或者是在文化的整体方面有别，如美国之内的希腊人、波兰人、意大利人、瑞典人等等。研究这些群体的主要目的是：要发现这些不同来源的人所构成的群体范围，它们以其共同的民族、或旧省界文化的特点，正成为一个群体整合的焦点，并且与其海外的同族人取得持久的联系。

在运用“群体”这一词时，一般是指一个大的文化和民族中的较次要的、人数较少的群体。

——周大鸣（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注

* 顾定国（Greg Guldin）1977年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获得文化人类学博士学位，目前在美国太平洋路德大学执教。近12年来一直在研究香港族群和城市的组织化问题。1986年曾在广州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任一年客座教授，并同时开始致力于中国农村的城市化和中国人类学史的研究。

要族群聚居区”是不同的。次要性区域中所居住的人是那些原先族群聚居区和其他族群中原先的居民，而不是大批数量的新移民。无论因为什么原因，移居链被打破了。次要性区域在没有不断地增强文化和族群关系的条件下得到了发展，而原先性区域却受到文化和族群关系的不断增强的制约。

次要和原先族群聚居区均由移居者所居住，但他们移居的来源有所不同。原先区域依靠的是非本地性的移居浪潮，而次要性区域的形成大都是这些种族在都市内部的移居。我们必须多理解社会和城市范围的倾向来看原先性和次要性族群聚居区的发展和衰落。

香港的移居模式

为了理解香港都市中的族群问题，需要了解一下来到香港的不同的中国人群体，以及他们后来在香港殖民地的重新分布情况。作为英国皇冠殖民地的香港，从1842年直到20世纪30年代太平洋战争前夕，人口并不多。第二次世界大战从中国各地来了大量难民，给族群多样性增添了新的内容。来港的大量城市人是广东人，乡村来的人中多为客家人。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时，潮州人开始大批涌入香港，这一现象一直持续到1945年日本的占领结束为止。1946年到1950年的再度内战使广东人和所谓的上海人（即来自上海和江浙各县以及中国其它地方的北方人）潮水般地涌入香港。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代初的困难时期和70年代中的开放时期，又不时地有一批移民进入香港，其中成批的福建人开始进入这块殖民地。

这一移居模式所产生的香港，以广东人为压倒的多数，再有相当数量的客家人、潮州人和较少数量的上海人、福建人，由于数量虽少但很显著的欧洲人和南亚人。有90%的人居住在香港岛、九龙、新九龙和新界的“新城市”等这些主要的都市调查区域内。

在香港内部的移居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从1976年到1981年5年内几乎有1/5的人口搬出了都市地区。其中1/4从九龙、新九龙和香港岛的旧都市地区搬出，到了新界的“新城市”。这些新的城市以具有乡村特色的新界为式样，既新颖又独立自主。设有住房、购物中心、学校、工业和社区设施。旧市镇也被扩展，而且现代化了。这些“新的城市”几乎拥有1/5的香港人口^①。在其他较旧的都市区域，内部移居也很显著，11.5%是在他们的居住区内移居，24.6%搬到了其他的居住地区。

都市内部移居的关键因素是政府的住房计划，尤其是那些50年代时建造的供定居用的廉租屋邨，当时为了应付大批战后流入的人口以及为了应付60年代后期的入港大潮流。新兴的城市引起了人口的重新排列和过去曾是乡村特色的新界的都市化。按传统惯例，旧都市区内发展工业会造成人口的内部移居，交通发达时更为如此。70年代早期开放了海底隧道，市内交通更方便，给人们提供了更多工作和住房的机会。

具有住房潜在力是产生内部移居模式和种族定居的又一因素。突然具备公房这一现象不仅满足了那些急需找房的人，而且还吸引着要来私人建房的一些人。族群居住的地点和族群聚居使产生族群聚居成为了可能，这常被解释将族群移民高潮与在某一特定地区住房条件的突然供应的一种幸运的结合。着重研究一下某一特定地区将会很清楚地明白这一情况。我们来看一下香港岛的北角区。

^① 香港调查统计局：《一九八一年香港调查报告》第一卷，635页。

北角区：一个主要族群区域

福建人占了600万香港人口的大约3%。从20世纪50年代起，中国的福建人成批地来到这块殖民地，起初都定居在香港西北沿岸一带的古老的商业区里。由于东南亚的海外华人与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受到了冷战的破坏，大多数男性华侨对回到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惴惴不安，所以香港的住房只是首批移民的约会地点。

上环是最初定居的场所。因为战前在香港的大多数福建人都是海员，而上环是个要塞港口。然后1950年以后大批的福建人流入香港，使这个地区的住房变得很紧张，于是福建人开始在香港的其它地点寻找落脚的地方。50年代中期，政府的和私营的工业开始发展起来，原来鲜为人定居的香港岛北岸的东部地区和北角地区，开始迅速盖起了多层的楼房住宅街区。这些住宅区起初只是福建人中产阶级的选择对象，很快北角区变成了新老移民们所追求的稳定地点了。到了60年代中期，北角区蚕食了上环，一举成为福建人在香港的生活交点。新入港者不断涌现和都市内部移居现象这两者的结合，把北角区改造成了所谓“小福建”这样一个主要族群区域。尽管北角区原先并不是福建人在香港的落脚地方，但是由于从中国大陆来的福建人直接在那儿定居和那些短期福建港客的定居，使北角区一跃而成在港福建人的第二个主要族群区域。

红磡和鲗鱼涌：次要族群聚居区

60年代中期和后期的中国文化革命使移民处于低潮。70年代出现了福建人移居香港的新势头。但这次不是所有来港的人全到北角区定居，因为在其它地方已经出现了福建人来港后定居的新区域。60年代，附近的鲗鱼涌先建了许多村镇工业和轻工业工厂。由于乘短途电车就能赶到，于是许多福建人首先到鲗鱼涌去找工作做，接着就在那里定居了。还有一个福建人定居的新区——红磡出现了，因为这个区交通便利，靠近新九龙——荃湾和官塘的新工业区。从北角区出发只需20分钟的摆渡就能越过维多利亚海港。从那里返回来探望朋友和家人很容易。上班时，九龙这边的公共汽车能很快将你从红磡的家中送往工业区去。

70年代初期以来，其它两种运输交通方式使红磡和九龙对那些与北角区和香港岛有亲朋好友和经济往来的人，吸引力就更大了。这就是海底隧道和地铁。海底隧道是在1973年通行的。10年以后又开始建地铁。这些意味着交通运输已不成其为障碍了。此外，福建人对香港的生活也更适应了。人们能理解他们为什么要搬迁到这些新的地方去居住。

红磡对许多居住在北角区的福建人也很有吸引力，因为那里的房租很低廉。人口要更涵化的话，房租低廉这一点是很关键和引人注意的因素。从北角区向和红磡鲗鱼涌这一都市内部移居的现象至今一直有增无减。由于长期在香港居住的人口占有很大的比例，所以这两个地区的族群性很不显著。

如果将红磡和鲗鱼涌定为次要族群聚居区，那么我们必须首先认同这两个地区既是族群聚居区又是次要性族群聚居区。这里的居民多为居住在港已久的福建人，他们已经作了两种同化，其一是对香港都市生活的同化，其次是对广东文化的同化。所以，新福建移居者与久居香港的福建人存在很大的差距，使他们的原先族群聚居区和次要族群聚居区有极多的分别。

在香港，涵化的关键是看他在港居住时间的长短。50年代后期和现在的新入港的人并不需要适应香港生活的过程。不管通过什么渠道，他们总是先和同乡住在一起。有人教会他

们如何去市场、商店、购物，如何打电话，穿越马路等。经过几天的熟悉过程以后，他们很快就跟广东人或香港人一起学着生活下去了。在前几个月的适应过程中，遇到事情，他们的主人就告诉他们这些是当地的什么风俗，主人还安排他们的衣食住和吸烟等。

对这些移民来说，并不一切都一帆风顺，许多人常常感到他们的香港亲戚或朋友只是在尽他们最低限的努力。而那些长期居住在香港的人却感到新来的人并不理解尽管在香港能攒钱，但生活还是艰难的。另外，这些初来乍到的同乡常常土里土气的，与香港的都市文化还不协调。这些来自农村的移民常常把香烟头扔在地上踩灭，随意吐痰，得罪有自尊心的女主人。然而对大多数新移居者来说，并不是与其他福建同乡相处会出现问题，倒是香港本身使他们不习惯。

听惯了香港人人都很富裕的传闻以后，他们与世界其它地方的移民一样并不相信或不理睬那些对香港的富裕表示怀疑的说法。他们所期望的是能找到新的富裕的生活。当许多人见到福建人在香港的拥挤不堪的居住条件时，他们尝到了文化冲击，他们很快认识到，尽管香港的东西比大陆多，而且都能买到，但只是有钱的人才买得起。所有的人在某种程度上都对香港的生活感到失望。特别使他们感到震惊的是，香港人每天都面临着很大程度的忧虑和不安全感。于是他们陷入了迷惘，一些人就返回了大陆。

香港的老住户也诉说最近来港的人与那些早来的人（即他们自己）有些不同了。他们不能象真正的福建人那样吃苦、实干。他们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安全生活惯坏了，在中国大陆人们无需耽心丢掉饭碗，耽心犯罪和通货膨胀。这些年青一代福建人对生活看得非常平静。最明显的是他们在大街上走路时慢慢吞吞的样子，而大多数香港人走路来去匆匆。这些福建人的处世态度也使老港客很不理解，如果他们错过了一辆公共汽车，他们觉得没什么了不起的，过几分钟不又会来一辆吗。

小福建的长住者是不能老悠然自得的。他们受香港生活所裹挟，为谋生、为未来而拼搏。在一些人中间，他们与所谓真正的福建人之间出现了差别，因为他们把福建看成一个落后和封建的地方。使他们引为自豪的是，他们自己变得更现代派和西方化了。然而这一“香港化”的感情却是一种非常模糊的感情。因为这些长期在港定居的人感到20多年来，他们也变坏了，常常变得象香港人那样既自私又贪求物质生活。中产阶级背景的福建人及其生活方式受香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涵化比那些工农背景的福建人涵化起来，矛盾和冲突要小得多。这些中产阶级的福建人谈他们自己已经“香港化”和变得象“广东人”了，是由于他们长期的在港生活，由于他们说广东话几乎不带口音的缘故，还由于他们遵照了在香港的许多习俗的缘故，如广东人的互访和饮食模式等。

涵化很自然使这些长期在港居民和鲷鱼涌以及红磡居住区的人看上去不太象福建人了。特别是当我们记住香港人用来衡量中国种族性所使用的种族涵化指数这一点的话，在区别其不同时，决定是什么促进某特定地点的“种族低抛面图”取决于确定寻找的是哪一个居住区域。当问到群体之间的差别时，在香港的中国人常常这样说，现在这种区别几乎很少了，“在香港的中国年青人都差不多”。为了证实这一论点，以这些常在港的所有中国人都说广东话、都吃广东饭菜以及几乎都穿西装为例。这三方面是看一个群体在人口上适应香港的标准。在语言上、吃的方面和穿着方面与香港习俗的接近程度，取决于“与在香港的其他中国人的接近相似”的程度。

在种族涵化问题上应把语言放在首位，尤其是我们对待那些大批的说同一种方言的种

族这个问题，就更是如此了。尽管许多人断定说，现在香港人人都说广东话。实际上语言涵化问题并不是那么纯的，在北角区足足有42%的福建人说闽南话。除了广东人群体以外，没有其他种族有这么高的比例的人是继续说他们的方言的。如果回顾一下福建人移居相对晚近的情况，以及55%的在港福建人并不出身在这块说广东话的香港土地上这一事实，那么近一半的福建人讲闽南话看起来就很合理了。进一步将说福建话人的年龄与福建人社会的整个年龄加以比较的话，表明说福建话的人要比香港福建人居住区一般的人年龄要大，这种状况便更不足为奇。

饮食——这一种族涵化指数的第二因素也显示出很深的代沟。年纪大一点的福建妇女不外乎以菠菜、花生、米粥和典型的福建式最差食物，白薯和咸菜瓜为食品。即使这些年长妇女有条件吃得更好一点，但她们宁愿在香港吃这些福建地方味食品。他们坚信福建饭菜最佳，而把广东食品排在第三位。然而广东人和其他地方的人却是众口推崇粤菜。年青一代的福建人也不否认这一点。事实上他们越年轻，就越称赞广东饭菜。对这些人来说，福建饭菜并不是他们的最优选择，当然会是第二或第三位的选择。

衣着则是衡量涵化的最后一个公认的标准，也许它能为我们提供最为鲜明的区别。女子的服装体现福建的地方特征，又能从个别人的身上体现出文化潮流。年长的福建妇女穿中国传统式的服装，包括头发上装饰的珊瑚红点。这是福建籍的特色。中年妇女常常用来自菲律宾的布做成连衣裙，既象征她们有海外关系又与同龄人的特色保持一致。那些年轻的福建人在服装式样上几乎与典型的香港居民没有什么区别。只有他们才从衣着上显示出香港的文化倾向，例如他们学会了香港人在家里和夜间穿睡衣的习惯。而穿睡衣在福建老家是从来没有的，目前在香港的年长一些的福建人也是不穿的。

然而，这些只是证明福建人在香港取得了最基本的适应，这些适应是为了生存和为了在异地他乡长期地滞留下来。在港的中国人聪明地接受了衣、食、语言这三方面的特征，作为移居后涵化程度的指南，并将其看作几代人涵化过程中在所难免的东西。也许这确实如此。然而从人类学的观点来观察问题，我们认识到目前所进行的这一涵化过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远非只是在语言、饮食和衣着上的变换。正是在这些次要性族群聚居区，常常在同化和涵化问题上会做出关键性的战略决定。

然而，对这些次要性族群聚居区的种族涵化问题的分析往往会被社会所忽视（也会被研究人员所忽视）。这提醒我们为了确定某个居住区域的持续族群性，不能只看其外部标志，还要看到其它方面。假定有这么一个次要族群聚居区，其中存在着人所共知的“潜在的”族群性的话，那么我们会象对一个主要族群聚居区一样地感到肯定，也就是街区、市场和街道都是大量地以族群式的关系聚居起来的。将来他们仍是以族群为基础聚居呢，还是其聚居程度会下降呢？在北角区，居民的族群聚居性看来下降了，原因是福建人从那里搬到了红磡和鲗鱼涌。某些福建家庭中全家合住现象的减少会使福建人与其他地方的人互相影响，于是这一可能性使我们考虑到家庭和朋友的首要关系不一定非以族群性聚居来决定。如果这里族群聚合程度比主要性族群聚居区域低的话，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将次要性族群聚居区看作为只是一次在同化过程中的一个曲折？我怀疑我们只能这样去看待这个问题，只有以“族群散居”模式为依据来进行对次要性族群聚居区的长期研究以后，才能证实或否定我们的怀疑。

责任编辑：谭 深